

# 国内对发展主义的研究进展

张 瑾

(中国农业大学 人文与发展学院 北京 100193)

摘 要:产生于西方工业文明时期的发展主义强调经济增长,忽视人、社会、生态环境等方面的协调发展,进入后工业文明时期众多学者对其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发展主义在中国既占据神坛之位又饱受质疑。通过梳理目前国内相关研究的类别和进展,提出国内对发展主义研究存在界定模糊、结合国内发展理论不足、国家发展战略分析和社会变迁阐释不够深入等问题,但以发展主义学说研究农村社会的视角具有开创性意义,值得深入探索。

关键词:发展主义;发展研究;国家;社会;农村研究

中图分类号:C0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6-0042-03

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同时兴起三大浪潮:新自由主义、对发展的反思和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弃置二战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角色,开启了市场主导经济政治发展的新篇章,是新古典经济学家在发展经济学家中的胜利。当强调“市场万岁”的新自由主义突破国家和政治的界限时,就出现了世界政治经济体系化的全球化。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全球化,抑或是它们取而代之的强调国家作用的各种理论学说,唯一不变的就是“发展”这个宗旨。发展被神圣化、信仰化,甚至成为一种“主义”,被奉为人类生存的圭臬。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统统是发展的代称,GDP、资本、利润全部是发展的符号,而贫富差距、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人性化却无疑成为发展的代价。因此,在各国纷纷追求高速发展之际,西方一些学者踏上了反思发展的征程。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主义愈加现形,经济迅猛发展,精神文明远远滞后,生态环境日渐破坏。在西方社会开始反思发展的影响下,国内学者也开始审视中国发展中遇到的社会问题。本文旨在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以更好把握国内对发展主义的研究进展。

## 一、发展主义的概念界定

早在1999年《读书》杂志刊登了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一文,这是国内最先涉及发展主义概念的文章。“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认为经济增长是社会进步的先决条件的信念。”<sup>[1]</sup>将发展主义定义为一种意识形态,他指出发展主义是源于西方特定时期经济增长产生的思维定式,它忽视了复杂的文化、社群及偶然

性因素,排斥了本土人们的生计与文化实践,将发展锁定在工业、技术与生产上。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对发展主义的解释为“特指具有拉丁美洲特色的一种经济发展思想。1949年拉美经委会领导人普雷维什发表了《拉丁美洲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重要论著,为发展主义奠定了理论基础……”<sup>[2]</sup>这一解释追溯了“发展主义”这一术语最初正式使用在何种语境下,这一语境即六七十年代拉美诸国在普雷维什“中心—外围”理论下采取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叶敬忠等在《发展主义研究评述》中把发展主义划分为拉美型、东亚型和西方型三类,这一概念代表拉美型发展主义<sup>[3]</sup>。

黄平在《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中谈了“23点”,思考了西方中心论、经济增长论、线性进步观等理论问题和失业与劳动力市场、资源、人口、贫困等社会问题<sup>[4]</sup>。在这一基础上,他给出了定义:“发展主义严格地说应该是‘开发主义’,指的是一种源起于西欧美特定的制度环境,并在六十年代之后逐步扩张成为一种为国际组织所鼓吹、为后发社会所尊奉的现代性话语和意识形态。”<sup>[5]</sup>这一界定体现了发展主义的行动性、实践性,国家和地区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都是在“开发主义”思想指导下完成的。

周穗明认为发展主义“是继战后‘马歇尔计划’之后西方阵营的第三世界发展战略,也是包括‘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以及种种关于高科技、工业化、国家干预或市场机制等不同版本的发展学说的总称。”<sup>[6]</sup>这

里涵盖发展理论、发展主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论。并且他通过比较发展主义与新发展主义,指出发展主义在哲学、理论、观念等层面存在的种种缺陷,提出发展应尊重文化差异、坚持多元文化主义,走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类发展道路。

雷龙乾从哲学层面描述了发展主义的特征,认为“人本主义或人本主义强调以人为本的实践价值观,是发展主义哲学的价值旨归;理性主义或科学主义追求认识的客观有效性,是发展主义哲学的思维原则;而经济主义或资本主义反映经济发展、资本增值的自发机理,促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精神气质和文化格局。”<sup>[7]</sup>这一对发展主义形而上学的理解为反思发展主义的哲学层面提供了理论依据。

综上所述,尽管学者对发展主义的理解有几点认同:源于西方工业化,是特定时期的产物;把经济增长奉为社会进步的标尺;有多种学说;“新发展主义”是对发展主义的反思和解构。但因涉及领域之广,其概念仍相对模糊。只有对概念认识上统一,才能深入研究理论问题。

## 二、对发展主义的理论研究

刘森林和陈向义探讨了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关系。二者对马克思主义是否属于发展主义有不同的观点,但对当今发展主义带来的社会问题具有共识。刘森林将可持续发展作为代替“弱发展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重建发展理念的新方案<sup>[8]</sup>。陈向义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不会导致发展主义的实践的”,但“当前中国也确实存在着朝向发展主义的趋势”,因此他强调要坚定落实科学发展观,避免真正陷入发展主义的陷阱<sup>[9]</sup>。

相较于刘森林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解,张光君和彭新武走得更远。张光君认为,唯发展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增长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也将发展等同于进步,仍然沉醉于人类中心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不能自拔,实质上仍然是一种欠缺全面性、协调性和科学性的发展模式”<sup>[10][11]</sup>。彭新武不仅指出了可持续发展的弊病,而且提出建议一种以“人—自然”系统为基础的生态文明价值观,“在这种文明观念中,人类真正积极的生存方式的首要特征应是基于自然整体及其生态平衡尊重的可持续性,而不是物质财富的无限增长”<sup>[12]</sup>。

从发展的价值目标角度质疑发展话语,邓万春指出“发展主义倾向则把财富的增长看作衡量发展的基本尺度……其结果就是隔断经济增长与文化、社会和政治的联系,使发展的价值功利化、物化”。因而批判发展主义重要的是正确定位发展的价值目标,只有在“尊重、自由、公正、以人为本等更为全面、深层的价值诉求”下才能更好地引领发展实践<sup>[13]</sup>。

上述学者关于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观与发展主义之间的关系的论述对探索中国发展理论、警惕西方发展主义理论侵蚀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理论探索处

于起步阶段,理论分析的现实性仍不够突出。

## 三、对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研究

我国的发展要警惕西方权力的渗入,因此要认真对待地方与权力关系的问题。本土知识是“一种可以通过‘彻底解释’获得的可以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知识”,权力问题也不是简单的“支配—抵抗”,而是具有多样关系的发展干预综合体<sup>[14]</sup>。此外,在有限时空内寻求快速发展使我国面临很多困境。西方社会经历了现代取代传统、后现代超越现代的自然发展过程,而我国的发展是在有限的时空环境内容纳了西方社会两个世纪的社会变迁,加之内部人口众多、外部国际资本主义的扩张,我国的时空条件受到严重的挤压。认识到“时空压缩”的现实性才能找到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超越进化”或许是应对困境的出路<sup>[15]</sup>。

郁建兴等人认为我国是发展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地方政商合作和国家合作主义的综合体,而重构国家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超越现今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是新世纪的要求<sup>[16]</sup>。碎片化、二元化的社会政策体系急需转型,他强调通过政策转型实现国家发展模式转型<sup>[17]</sup>。李学文等人则追溯了国家发展、税收制度与地方政府收入的政策演变及三者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将土地作为发展主义核心要素的经济增长模式取得了显著经济成绩,但也带来了种种社会问题<sup>[18]</sup>。该文章在针对农村土地的社会斗争、抵抗行动层出不穷的当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一文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国家发展模式进行了反思。文章指出,撒点并校并非发挥教育的功能,是规模、效益等经济学考虑,是发展主义的逻辑在作祟,中国成为高端奢侈品的消费大国是发展战略中经济增长高于一切的原则所致<sup>[19]</sup>。发展主义在中国已经现其原型,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警惕,更要寻求发展之外的本土模式。

分析国家战略的发展主义文章倾向于论述中国模式和国家转型。快速工业化、高速现代化使国内的发展也进入了瓶颈期,探讨国家转型、寻求突破唯经济论的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当前的研究仍较为宏观和浅显,指导国家如何转型、如何包容性发展的建议将成为未来的研究方向。

## 四、对发展主义的社会变迁研究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有助于扭转经济建设为中心、建立国家公共治理体制,从未实现对当前发展主义模式的突破。当前的任务不仅是要突破发展模式,而且要在公共治理体制取得创新性进展,因此需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达到真正解放思想、寻求发展新出路的目标<sup>[20]</sup>。何子英追溯了西方福利国家的起源与形成,指出尽管社会结构、历史背景存在差异,我国不能照搬西方福利国家模式,但我们要积极学习“福利主义共识”,在经济与社会福利间寻求平衡点,实现国家发展模式的真正转型<sup>[21]</sup>。

早期的发展主义是“高积累、低消费”,而发展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呈现消费主义的特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发展是“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战略,而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全球化下消费主义冲击,形成一个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sup>[21]</sup>。高积累与高消费并存的让我国的发展局面更加复杂化。

关注发展中的社会成员是研究社会变迁的另一视角。邓万春探讨了国家社会动员能力的变化,认为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后,国家对资源控制能力下降导致社会动员的实际能力减弱;然而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主义倡导下,社会动员逐渐向效率优先的方向发展<sup>[22]</sup>。郑杭生则对社会成员是否“有感发展”进行了研究,指出当前国家社会的格局是“国富民弱”“无感增长”,所谓的快发展、高增长都是“发展的幻象”,发展的成果并没有惠及普通百姓。要实现广大人民“有感增长”,必须突破旧式现代性的发展主义,寻求一种以人为本、民生为重的“新型现代性”理论范式<sup>[24]</sup>。

无论是公众参与、消费主义还是社会动员“有感增长”,所有这些对社会变迁的研究都指明一点:人民是发展的主体,也是发展的目的,发展主义也许能带来一时的“幻象”,但不会带来永恒的利益,只有关注人们生活的发展才能可持续。当前对社会层面的发展主义分析不够深入、力度不足,这一方向的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 五、对发展主义的农村问题研究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的农村改革不是单纯的制度变迁而是带有浓厚的社会动员色彩,是一种继承于毛时代的“国家动员式发展主义”<sup>[25]</sup>。但当今我国农村经过公社化、集体化和三十多年改革洗礼已经不是概念意义上与“现代”相对的“传统”状态,而是一种复杂的、混合的不发达状态。当前的新农村建设应该既包含现代化的发展主义话语,也包含后现代化的反思、批判话语。只有这样才能既实现农村经济发展、农业产业化、农民增收,又保证农村社会文化、传统价值等地方性知识的保留、传承与发扬<sup>[26]</sup>。

潘泽全研究了发展主义道路下农民工群体的生存状态问题,中国现代化战略下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表现出对农民工群体的排斥和抗拒<sup>[27]</sup>。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发生在城乡二元结构框架中,而这一政策体现的是国家城市空间保护的理性逻辑和现代城市主义的发展主义逻辑,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社会排斥和不平等待遇。关注发展主义语境中弱势群体能否共享社会发展成果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项重大议题,对保证国家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良性运转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有重要的现实意义<sup>[28][29]</sup>。

叶敬忠对发展主义侵蚀农村社会的思考也充分体现了人文主义关怀。“被上楼”农民、失地农民“失去庭院的农村”,所有这些景象都是发展主义的恶果<sup>[30]</sup>。农村中小学“撤点并校”的始作俑者亦是发展主义,所谓“村不办小学、乡不办中学”的规划,正是以调整表征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

策略。其结果不是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而是农村家庭教育负担的加重、交通安全隐患的增加和辍学儿童的增多<sup>[31]</sup>。

朱晓阳通过对滇池东岸某村庄的田野研究,论述了更为复杂的农民、国家与发展主义间的关系。他认为发展主义是当前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无论是国家还是农民都接受了这种价值观,成了“发展主义的囊中物”。农民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是抵抗而是“更激进”地推进,他们并没有坚持所谓的“传统”,而是与政府协力共同打造发展主义知识话语,为的是“从这些政治和经济的生态约束中获得更多的土地、水利、粮食和能降低生存风险的空间”。并警惕在关注发展主义带来的生态恶化时,不能忽视农民的参与行动<sup>[32]</sup>。

反思发展、批判发展主义是大多数学者以发展主义视角研究中国问题的出发点。发展主义不是普世理论,它只是西方资本主义在特定时期特定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经验。走出历史、面对现实,非西方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并不是走当今发达国家的老路子,而是回归自我、尊重民众。正如埃斯科瓦尔在其《遭遇发展》一书中所说,文化差异才是我们这个时代关键的政治实事之一,我们寻求的是基于本土的发展“替代方案”,我们追求的是一个五彩斑斓的、充斥混杂文化的后发展时代。中国的农村、农民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文化传统和价值观,有权利掌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当前的生存状态,任何地区、任何个人都不应该成为发展主义的牺牲品。面对强大的发展主义浪潮,学者的反思与批判看似苍白无力,也许真正能够对抗这头怪兽的总是不起眼的“小人物”,那些源于乡土、发于底层的草根运动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新的希望。

##### 参考文献:

- [1]许宝强.发展主义的迷思[J].读书,1999(07):18-24.
- [2]庞元正,丁冬红.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新词典[M].长春:吉林出版社,2001(10).
- [3]叶敬忠,孙睿昕.发展主义研究评述[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2):57-65.
- [4]黄平.关于“发展主义”的笔记[J].天涯,2000(01):37-39.
- [5]黄平.发展主义在中国[J].科学中国人,2003(09):50-52.
- [6]周穗明.西方新发展主义理论述评[J].国外社会科学,2003,(05):44-52.
- [7]雷龙乾.西方发展主义哲学的缘起与发展[C].第五期中国现代化研究论坛论文集,2007.
- [8]刘森林.透视唯物史观中的发展主义[J].河北学刊,2005(03):111-115.
- [9]陈向义.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主义的关系探析[J].哲学研究,2007(05):15-18.
- [10]张光君.唯发展主义的思想迷误与逻辑悖谬[J].前沿,2010(19):147-154.
- [11]张光君.唯发展主义再批判[J].理论月刊,(下转55页)

(上接 44 页) 2009,(06):38-42.

[12]彭新武.“可持续发展”的合理定位[J].社会科学研究, 2002(02):35-40.

[13]邓万春.发展的价值目标批判及新趋向[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04):1-5.

[14]朱晓阳,谭颖.对中国“发展”和“发展干预”研究的反思[J].社会学研究,2010(04):175-198, 245-246.

[15]景天魁.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

[16]郁建兴,石德金.超越发展型国家与中国的国家转型[J].学术月刊,2008(04):5-12.

[17]郁建兴,何子英.走向社会政策时代:从发展主义到发展型社会政策体系建设[J].社会科学,2010(7):19-26, 187-188.

[18]李学文,卢新海.地方政府与预算外收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问题[J].世界经济, 2012(08):134-160.

[19]叶敬忠.发展、另一种发展与发展之外[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1):5-8.

[20]郁建兴.解放思想才能构建和谐社会[J].哲学研究,2008(05):3-9, 127.

[21]何子英.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模式及其对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启示[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9(02):160-169.

[22]申端锋.发展主义与消费主义的二元悖论[J].读书,2006(06):23-26.

[23]邓万春.社会动员:能力与方向[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

会科学版,2007(01):65-72.

[24]郑杭生,黄家亮.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中国社会转型新命题及其破解[J].社会科学家, 2012(01):7-11.

[25]邓万春.制度变迁,还是动员式改革——社会动员视野下的中国农村改革反思[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1):5-10.

[26]邓万春,景天魁.现代化与后现代化:双重的新农村建设[J].探索,2012(01):142-146.

[27]潘泽泉.现代化与发展主义语境中的农民工发展困境[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05):42-48.

[28]潘泽泉.中国农民工社会政策调整的实践逻辑——秩序理性、结构性不平等与政策转型[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 2011(05):55-66.

[29]潘泽泉.国家调整农民工政策的过程分析: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J].理论与改革,2008(05):59-61.

[30]叶敬忠.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的社会宏观背景分析[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04):5-21.

[31]叶敬忠,孟英华.土地增减挂钩及其发展主义逻辑[J].农业经济问题,2012(10):43-50, 111.

[32]朱晓阳.黑地·病地·失地——滇池小村的地志与斯科特进路的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2):22-48.

(责任编辑 李鹏飞)